

世界史学科新探索的开端

——世界史学术讨论会在武汉举行

最近,在武昌举行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湖北省世界史学会和武汉大学历史系联合主办的世界史学术讨论会。会议由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吴于廑同志主持。这是世界史学科一次规模空前的盛会,取得了多方面的丰硕成果。参加会议的一百五十多名代表来自全国各地的高等学校、研究机关、报刊和出版单位,他们带来论文七十二篇,资料专辑五本。代表们就世界史领域中的某些重要学术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很多新颖观点和独特见解。在大会作学术报告的有齐世荣、罗荣渠、胡宗达、沙丁和端木正等教授、专家。对历史科学如何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历史发展的动力和资本主义在世界史上的地位作用,如何在奴隶制社会多种生产关系中区别其主从关系,拉丁美洲现状的分析及国外某些专题研究动态等问题,提出了新见解,作了的大胆的探索。

会议期间,着重讨论了武汉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部分同志编写的一套近百万字的《世界史纲》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大家认为,该稿从世界全局着眼,努力反映世界历史发展的整个进程和客观规律,在阐述各个时期的历史横断面上下了功夫,突破了苏联和国内已有的许多同类著作,把世界史写成各国历史汇编的框框,有一定特色,是一次新的尝试。其中,古代部分突出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和各地区、各国家间的相互联系及其影响,较清楚地反映了世界历史由分散性、闭塞性向统一性、整体性的发展;中世史抓住了不同时期各地区、各国家封建制度发展的特色,避免了过去同类著作中内容一般化,体例结构一刀切,把国别史逐一罗列的现象;近代史在阐明世界历史的总过程中,全面反映了当时世界的各种基本矛盾及其相互关系和影响;现代史则抓住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这个现代世界历史发展的主流,破了传统的“苏联中

心论”和“大国决定论”。参加讨论的代表认为,征求意见稿的各部分都有大胆的创新,在探索编写世界历史新途径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不足的地方是:比较普遍地忽视经济、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史的叙述,这在近、现代史部分尤其显得突出;在分期问题上标准不统一,特别在古代和中世史的衔接上还存在较大矛盾;有的部分只注意突出历史发展规律的共性而忽视了特性;有的部分还未能摆脱苏联史学中某些偏见、某些教条的影响;有的地方夸大了外因的作用;有的地方还未能突破禁区,进行深入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大家希望编者进一步解放思想,对若干关键问题作深入探索,吸收新的科研成果,并在此基础上修改提高,以争取早日与读者见面。与会代表还就下面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讨论。

世界全局观点问题

征求意见稿曾就此作过三点说明。大家除同意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外,还从不同角度作了补充。有的认为,贯彻全局观点,就必须突出世界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写出世界历史怎样从最初孤立的点,到一个地区的片,再到全世界的面的发展;有的认为,贯彻全局观点,除了写出世界历史发展的共性外,还要写出各地、各国历史发展的特性,为此,必须对各地、各国的历史进行比较研究;有的认为,贯彻全局观点,就是要考察一定时代内世界一切矛盾(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的总和,要全面反映世界各种基本矛盾及其相互作用;有的认为,贯彻全局观点,就必须抓住各个时代世界历史发展的主流;有的认为,贯彻全局观点,就要抓住影响全局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运动,如民族迁徙,影响深远的战争和革命运动,科学技术的重大发明,重要交通要道的开辟,经济文化的传播等等。

分期标准问题

大家认为,这是整个征求意见稿尚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它涉及到各段的衔接,也涉及到各段历史内部的分期,全书必须统一。有的主张按社会形态分,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分期的基本原则。有的则认为以社会形态作为分期标准是社会发展史的写法,用它作为通史分期则只适用于国别史,不适用于包括许多发展不平衡地区和国家的 世界史。因为适用于西方国家历史的分期法不一定适用于东方国家,且同一时代里常常是多种社会形态并存,特别是从世界历史来说,由于各地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在两个社会形态交替时期的划分上产生实际困难。因此,他们主张按年代划分时期,即以多少千年,多少世纪,或一个世纪中的多少年代划线。这样,不仅能更好的贯彻世界历史的全局观点,看到同一时期各地区历史的相互联系和影响,而且能反映出世界历史在同一时期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多样性,各段交接处的矛盾也解决了。另一些同志则认为,应该把社会形态和年代结合起来,按原始时代、奴隶制时代、封建时代、资本主义时代、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划分。这样,就可以做到社会发展规律的阶段性和历史时间性的统一。

对征求意见稿把中国在战国时期进入封建社会作为世界封建时代的开始,也有不同意见。一些人赞同,认为只要一种新的社会形态诞生,就标志着新的时代开始;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一标志只能勉强适用于世界已形成整体的近现代史,不适用于古代。因为古代各国还处于相对孤立和闭塞状态,一国内出现了新的社会形态,对当时世界的影响是不大的。当公元前五世纪中国最早进入封建社会的时候,世界的广大地区还处在奴隶制的产生、发展和繁荣时期,只有到公元后五至六世纪,当世界广大地区的奴隶制都走向衰亡以后,奴隶制时代才算结束,开始了封建制的时代。还有一些人对中国封建社会始于战国时期的说法,持有异议。

至于同一时代内部的分期,则一致认为,应以相应的社会形态或时代主流发展演变的阶段性作为标准。

动力问题

不少同志认为,征求意见稿有些部分过分强调了阶级斗争、政治斗争,忽视了生产斗争、经济变

革、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方面的历史。一些同志认为,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对阶级社会的历史也是不准确的,理由是:第一,阶级斗争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表现,它最后还得落脚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面,所以,阶级斗争并不是最本质的东西;第二,我们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单纯归结为历史就是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样一个观点;第三,以阶级斗争为纲,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容易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在历史科学方面,则容易导致把历史简单化,把历史片面理解为政治史、阶级斗争史。另一些同志则持相反意见,主张历史就是应该以政治史、阶级斗争史为主要内容。理由是,生产力的发展对于历史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变革当然起着最后决定的作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也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和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转变的根本原因,但是,在阶级社会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集中表现为阶级斗争,只有通过阶级斗争和政治革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使新的生产方式取得统治地位,从而引起社会的飞跃和改变社会的性质。此外,有的还提到了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在推动世界历史前进中的作用,有的提出了还必须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东方封建社会发展缓慢的原因问题

大家围绕征求意见稿就这个问题的分析作了补充,主要可归结为如下两点:第一,城市发展的道路不同。在西欧,中世纪的城市是由逃避封建领主控制的力量重新建立起来的,市民力量发展较快,获得了城市自治,与王权建立了同盟,市民人身自由,生产和交易的主要是日用消费品,因之商品经济发展较快,市民较快地发展成为资产阶级。东方城市则是从古代继承下来的,官僚、地主、商人往往三位一体,手工业主要由官府经营,手工业者的人身依附较强,生产的又主要是供封建主使用的奢侈品和武器,致使商品经济发展缓慢,市民阶层力量较弱,资本主义关系难以产生和发展,封建土地制度也就难以瓦解。第二,封建上层建筑的阻碍。如中国、朝鲜和越南等国实行科举取士,使王权可以通过吸收中小封建主参与政权扩大其统治基础,保持封建政权的稳定,用不着与市民建立联盟。此外,许多国家一贯推行重农抑商政策,也不利于社

会发展。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问题

征求意见稿根据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认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是资本主义走向衰落的起点，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的出现，资本主义就进入了它的腐朽、垂死的阶段。但讨论中有些同志认为，上述看法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应该重新考虑。他们认为，垄断出现以后，生产力仍得到迅速发展，政治民主化的过程也仍继续进行，当代还有许多国家在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后，独立地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因此，关于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发展关系的问题，关于垄断组织的作用问题，关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作用问题，关于资本主义在世界近代史上的历史地位问题等，都值得重新研究。他们提出，可否认为存在着一个全世界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长时期。在这个时期里，资本主义制度基本上适应该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虽然暴露出来，但仍可以通过调节使之得到解决。另一些同志则认为，列宁并没有排除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在个别工业部门、个别国家、个别时期迅速发展的可能性，他只是指出了帝国主义腐朽、垂死的发展趋势。从世界近代史看，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频繁发生，工人生活的贫困化，资本主义各种固有矛盾的尖锐化，都足以表明列宁对帝国主义所作的论断是正确的。

现代史主流问题

征求意见稿的作者们指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是世界现代史的主流，它开始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既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又包括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还包括各国人民的反帝反殖反霸斗争。这个世界革命的洪流贯穿于世界现代历史的全过程，决定着世界的全局，改变着世界的面貌，推动着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构成世界现代史主流的，是在世界各国各地区发生的重大历史运动和历史事件，而世界人民的反霸斗争则是当前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主要内容。这些论点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兴趣和赞同，并对与主流有关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讨论。第一，主流与全局的关系要很好处理，主流决定全局，但不等于全局。必须写好经济基础，从经济上说明政

治事件的深厚原因，对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对立面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状况及其发展演变也必须加以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阐明主流，把握世界全局。第二，对主流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国内发展和对外政策等，都必须根据历史事实实事求是地作出科学论述，不应简单地因袭苏联著作的传统看法，如对战时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等政策都应采取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对布哈林，不应作托洛茨基同伙和帮凶而应作为苏共党内一个派别来对待。托洛茨基在被逐出苏联以前，也应作为苏共党内一个派别来对待。对苏联对外政策中的一系列问题，如苏芬战争、东方战线，苏德条约及雅尔塔会议等，也都交换了看法，提出了若干的意见。第三，对有关主流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即民族解放运动的地位作用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具体问题，也交换了意见。

美国史组与会代表三十九人。会议期间举行了美国史研究会成立大会，讨论和通过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章程”，选举了理事会的成员，并决定在五年内由研究会承担编写一部约一百二十万字的六卷本《美国通史》。此外，研究会还决定编译《世界历史译丛》美国史专号和不定期、不拘形式地编印《美国史研究通讯》等刊物。会议共收到论文三十二篇，这些文章涉及的年代，上及殖民地时期，下迄当今卡特任内，数量之多，内容之广泛，在我国研究美国史的学术会上，还是空前的。限于时间，会议只讨论了美国历史分期，美国经济高速度发展的原因，罗斯福“新政”等三个问题。

拉丁美洲史组到会代表三十五人，收到论文十五篇。会议期间，成立了拉丁美洲史研究会，选举了理事会，集中讨论了拉丁美洲的独立战争和现阶段的民族民主运动，也讨论了对玻利瓦尔和格瓦纳的评价问题。

苏联史组到会代表十三人。会议期间，组织了《苏联现代简明史》编写组，主要讨论了编写该书的指导思想和大纲。对一些有争论的、复杂的问题，也作了初步讨论，并拟定在一九八〇年内分别写出研究文章或编辑专题资料，进行深入讨论。

会议开幕时，中共湖北省委书记黄知真、省委宣传部长焦德秀、付部长余英、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湖北省教育局和武汉大学的负责人会见了全体代表，并在会上讲了话。

(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